



东亚

「美」威廉·格莱姆斯 / 著
William W. Grimes
译科、任峰 / 译

货币对抗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中国必须打赢家门口的货币战争
夺取作为最高权力的「货币主权」

美元、日元和人民币为此押上庞大的赌注
世界上GDP总量最大的三个国家上演金融「三国演义」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东亚

「美」威廉·格莱姆斯 / 著

William W. Grimes

译科·任峰 / 译

货币对抗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货币对抗 / (美) 格莱姆斯(Grimes, W. W.) 著;
译科, 任峰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0
书名原文: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ISBN 978 - 7 - 5118 - 1101 - 1

I. ①东… II. ①格…②译…③任… III. ①货币—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东亚 IV. ①F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358 号

东亚货币对抗

[美] 威廉·格莱姆斯 著
译科、任峰 译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清 杨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版本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印张 16.25 字数 205 千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策划部·麒麟工作室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1101 - 1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中文版序言

本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得益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崛起这一大规模力量。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便是如何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过去，新兴大国的崛起通常导致破坏性的战争及其他对抗。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崛起是当代的一个核心挑战。但我依然坚信，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和平适应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我要向中国读者强调的是，本书并未采取美国民族主义立场，即中国的崛起具有危害或中国本身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不过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设法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和对抗的最小化。幸运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一致谨慎地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导人则自觉地通过多种手段来促进这一进程，包括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成员完全参与全球经济体系、20国集团（G20）及其他制度和论坛。到目前为止，在设法最大化共同利益、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的崛起位于历史上最为和平、最为互惠的崛起之列。尽管如此，随着中国从“制度接受者”到“制度设定者”角色的转变，某些摩擦也不可避免。东亚金融地区主义是亚洲经济体设法善用国际体系的一块阵地，但由于历史记忆、经济发展与增长、经济政策思想及外汇储备模式的差异，东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本书试图提出深刻见解，以探明东亚金融领域的三大关键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如何为规则和制度制定而角逐。

法律出版社决定出版本书的中文版,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国在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热忱欢迎中国的学者、决策者和对此颇有兴趣的公众阅读并讨论我的著作。

本序言将探讨几个中国读者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我将为中国读者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本书的受众主要是熟悉美国学术与政策讨论的读者,其他读者可能对其中某些思想和讨论产生疑惑。其次,本书终稿完成后的两年半以来,全球和东亚金融体系已发生了多个重大事件。源于美国的这场全球危机对我们的国际金融标准与实践的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各方迄今仍未就其警示教训达成一致看法。危机肆虐之时,在复苏全球经济和谋划重建全球和地区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核心作用。与此同时,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也有了重要进展,包括2010年《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的扩大化与“多边化”进展。因此,本序言将探讨本书所作的分析如何应用于这些新进展。

“现实主义”观点与中国的崛起

本书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英语学术研究中,现实主义分析法关注各国权力考虑对其互动作用的影响方式。一直以来,现实主义分析法都是美国和英国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但许多学者也同时提出批评,认为它无法解决思想和利益对各国国际行为的影响方式。

权力分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中的普及程度较低,因为互相依存与共同利益是经济互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一事实显而易见。传统上,人

们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各国推行重商主义或自给自足的动因;但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贸易与金融领域的互相依存和国际规则的发展限制了严格意义上的重商主义行为,自给自足也显然会导致经济停滞。本书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法,试图理解地区和全球经济关系中权力的应用。本书不再关注关税和资本限制等传统意义上的重要问题,而是将规则制定与对国际体系本身的影响视为经济领域权力与角逐的主要平台。从这一角度来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项最突出特点便是美国占统治地位,这体现在与几乎各种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规则制定、维护与调整上。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还在几乎所用“全球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在“巴塞尔标准”(Basel Standards)等国际认同还是实际存在的标准中都是如此。美国同时还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国,这使得它能够以本国货币进行国际借贷,并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最后贷款人。

在多数国家看来,全球美元体系一直具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国实行钉住美元制,从而能够稳定中国企业面对的国际价格。此外,中国也在逐步采用全球金融标准的过程中受益匪浅。然而,美国的金融结构性权力有时却对其他经济体造成了困扰乃至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与欧洲政府已试图减小美元及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自身的影响。在欧洲,这最终导致了欧元的建立,而日本在推广日元国际化时却不甚成功(尤其在亚洲)。本书主要探讨了日本利用地区合作来隔绝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

本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得益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崛起这一大规模力量。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如何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过去,新兴大国的崛起通常导致破坏性的战争及其他对抗。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崛起是当代的一个核心挑战。但我依然坚信,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和平适应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我要向中国读者强调的是,本书并未采取美国民族主义立场,即中国的崛起具有危害或中国本身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不过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设法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和对抗的最小化。

幸运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一致谨慎地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导人则自觉地通过多种手段来促进这一进程,包括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成员完全参与全球经济体系、20国集团(G20)及其他制度和论坛。到目前为止,在设法最大化共同利益、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的崛起位于史上最为和平、最为互惠的崛起之列。尽管如此,随着中国从“制度接受者”到“制度设定者”角色的转变,某些摩擦也不可避免。东亚金融地区主义是亚洲经济体设法善用国际体系的一块阵地,但由于历史记忆、经济发展与增长、经济政策思想及外汇储备模式的差异,东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本书试图提出深刻见解,以探明东亚金融领域的三大关键国家如何为规则和制度制定而角逐,即中国、日本和美国。

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最新进展

至少可以这样说,过去的两三年是全球经济的多事之秋。在源自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美国金融体系的某些弱点一览无余,各方开始希望建立新的国际协调机制来解决金融监管和全球失衡的问题。纽约和伦敦等金融市场体系具有优越性的观点已遭到了撼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停滞不前和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经历了多次衰退。

虽然本次危机及其原因和结果大有可谈,但这已超出了本序言的范畴。就本书而言,东亚金融地区主义产生了四项重大进展。在全球层面上,美国与欧洲监管者及金融机构的现有领导地位遭到了削弱,这导致了决策制定权散乱于系统内部。G20(中国与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关键成员)正是此种转变的一种明显体现。至于该过程将如何发挥作用,依然不甚明了。与此同时,现在仍无法断定美国理想中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是否具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可能性最大的是,各国将继续推动开放的金融体系,但发达经济体将加深对风险的理解,发展中国家则将更注重恰当的安排顺序。我认为,可以将中国充分视为自由化顺序的一个佳例,而非其替代方案。

在地区层面上,东盟+3财长就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CMIM)达成的协定或将对东亚未来的货币危机应对方法产生深远影响。以中国为首的部分东亚国家再次在地区内发起了对美元地位的讨论,并对地区选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各方对东亚本币债券市场重燃了兴趣,这是最隐秘但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转变。

《清迈倡议多边化》

在这场全球危机中,东盟+3财政就《清迈倡议》的扩大化与“多边化”方案达成了一致。根据公开报道,CMIM将建立一个真正的储备池,实行加权表决制而不附属于IMF。如果报道属实,那《清迈倡议》将与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 1997年由日本首先提出)大同小异,而本书第三章的分析法很大程度上需要重新考虑甚至根本改变。

然而,现实中的CMIM与AMF支持者的主张具有本质区别。首先,各个成员国继续持有大量外汇储备,资金释放与否在于政府决议。在这方面,这与第三章描述的形势完全一样。非应急决策制定也是一样,因为规则改变的前提是达成共识。决策制定程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体现在应急决策制定这一重要领域,即决定在危机爆发时提供资金。此处采用了加权表决制,中国与日本作为主导国家(两国各持有32%的表决权)。但由于依然与IMF挂钩,受灾国在不与IMF谈判的情况下最多只能获得20%的资金。事实上,加权表决制仅仅确认了IMF谈判正在进行,而CMIM资金不过是现行IMF货币危机管理的辅助。中国与日本支持此种安排的原因在第三章有详细论述。

无可否认,某些重要进展依然存在:参与国政府责任的明确性和标准化得到确立,未来潜在借款国的可用资金数额大幅提高,未来合作框架得到建立。但总的来说,我依然坚信,虽然达成了重大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定,但本书对CMI的评估仍然是准确的。

虽然CMI得到了扩大和加强,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场危机同样表

明该地区协定本身具有弱点。2008年9月底,韩国与危机擦肩而过,这便是最好的例证。由于CMI要求受灾国与IMF开展谈判,这并不是韩国能够用来解决其短期美元流动性难题的合适机制。事实上,韩国危机表明,应将CMI视为一种危机解决机制,但针对的只是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小型金融体系,例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出人意料的还在于,韩国当局并未向CMI伙伴中国和日本求助,反而强调韩国与美联储之间的美元互换额度具有可信性。虽然那时《清迈倡议多边化》已完全实施,但美联储却必须在韩国问题中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事实上,美国是全球危机的发源地,那时的美国仅仅是风中之烛。

货币问题

在写书过程中,许多学术同仁都对我探讨货币合作表示不解,因为这一论题鲜有人真正涉及。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美元占据统治地位,东亚国家难以抵抗其影响。在本书讨论的多个具体主题与论题中,这个问题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同时,我认为货币问题对本书的理论意义至关重要。

事实上,本书完成之后发生的种种事件恰恰肯定了我将其单列一章的做法。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在于,虽然危机源于美国,而且蔓延全球也部分归咎于美国领导的改革,但美元已成为了一个避风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重建全球体系流动性和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当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弱点完全暴露之时,美国强大的结构性权力或许得到了最佳体现,更不用提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所说的由关键货币带来的“超级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

与此同时,各方再次对全球经济体系中储备货币地位展开了讨论。对中国读者来说,货币问题应是最为重要的。暂且不论近几年美中双方重点关注的人民币估值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强烈要求改革全球货币体系,从而不再严重依赖美元。虽然此类改革提议和意向在未来五年乃至十年内都不具可行性——事实上,我依然强

烈希望美元在未来二十年内继续维持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地位——但美元的批评者提出了限制美国的经济权力,这是有理有据的。正如过去四十年间欧洲和日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所表明的,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它们越来越有可能演化为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我希望,本书能对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这个重要方面提供一些有益视角。

本币金融市场

最后,我将简单论述一下本币金融市场问题。第五章对多数东盟+3 新兴经济体(除中国)的本币债券市场表示悲观,认为它们不会对本书所讨论的更广泛的货币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该章同时提出,为建立广泛、具有流动性的本币金融市场,各国必须克服新兴市场经济中此类政策引发的政治困境和经济弱点,放开资本管制并采用全球标准。

迄今为止,本章提出的论点似乎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金融危机肆虐及美国财务模型多处丧失信誉的情况下,金融监管者并未大肆取消金融自由化或开放性。同样,在 G20 重建并加固全球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东亚的多数本币市场(除日本和香港)依然存在流动性不足、对债券发行者和潜在买家缺乏吸引力的问题。

尽管如此,已有迹象表明,主要地区和全球金融机构对东亚本币债券市场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银行有意进入崛起的东亚本币市场,这将促进债券市场产品及其流动性的多元化发展。东盟+3 政府将继续面临我所说的“通过国际化来实现隔绝策略”(insul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的矛盾情况,这将同时加重和缓解某些弱点。此外,东亚多数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的本国政治依然复杂棘手。但我愈发相信,盘活金融市场的经济依据正在积聚力量,可能对全球金融地缘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结 语

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我知道一切预测未来的努力都将以失败告终。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深入思考当前的趋势与决策在未来将如何发挥作用,那将无法有效分析此类趋势或推动政策讨论。在本书中,我试图系统考察权力考虑和利益分歧眼下和将来对东亚金融架构的影响方式。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理解这些问题,本书也有所涉及。但是,在提出了基于大国政治、连贯一致的论点后,我希望已对现实中的地区主义提出了某些深刻见解。对中国读者来说,我希望此种分析法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更不用说从美国学术传统的角度出发和重点关注日本面临的两难境地了。与此同时,我希望这一观点能为抱不同意见的读者带来益处,并推动中国自身就地区主义重要问题的讨论。

威廉·格莱姆斯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10年7月

致 谢

自 1999 年以来,我不断研究和思索,笔耕不辍而又几易其稿,本书便是这 8 年多来的成果。起初,我仅是想重新探讨自己首部著作中并未提及的问题,即“日元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终结以来,这一问题不断演变,每隔十年就会对日本的金融政治提出挑战。正当 1999 年夏天我在东京开展研究之时,“日元国际化”再次成为了政治对话的议题;与此同时,我也计划长期关注金融自由化的本国政治经济学,并借此加深对其理解。然而,我却发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争论,焦点是如何将日本和东亚隔绝于大规模资本流和美元价值波动之外。

尽管如此,“日元国际化”的提法最终失宠于政界与决策层。即便在 1999 年,其初衷也早已被更为雄心勃勃的地区金融隔绝观点取而代之,后者正是以日元国际化拥护者所发展的理念为蓝本。这是个令人为之一振的课题——它需要日本某些最为精明能干、聪慧过人的金融决策者和分析家群策群力,它同时也预示了东亚地区合作新纪元的开始。能够追述东盟+3 金融合作时代的形成历程实属荣幸之至,此外,我也庆幸长期以来能与业内人士和此类事业的观察家时常碰面。在此,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我一如既往的指引与指导以及时常的斧正。

研究期间,我曾多次造访东京,这与多方提供的经费和后勤保障是密不可分的。2001 年夏,美国 Marion and Jasper Whiting Foundation 优秀学者研究基金的一位研究员曾向该课题在内的多个研究项目提供了长达一个月的支持;2005 年,Fulbright-Hays Faculty Research Grant 基金为我对日元国际化和金融地区主义长达四个月的专注研究提供了支持。此外,

1999 年和 2000 年夏,个人基金各为我提供了一个月的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得益于美国国务院、东京大学、国际政策研究学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金融服务项目(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PIFS)、日本《读卖新闻》(*Yomiuri Shimbun*)和政策研究组(Policy Studies Group)的资助,我才能利用较短的访问进行采访和收集材料。PIFS 的年度美日和美中金融事务研讨会为我建立关系网和架构知识提供了帮助,但其具体讨论并未在本书中涉及。2005 年,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为我提供的休假研究使我能够完成研究的主要部分并开始全身心提笔撰写。2006 年秋,日本全球合作基金会中心(Japan Foundation 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旗下的著作基金为我争取时间完成初稿提供了巨大帮助。它支付了我的教学任务赔偿,并资助了在剑桥大学和东京大学举行的作者研讨会,会上我得到了宝贵的批评与指导。与此同时,衷心感谢日本财务省(Ministry of Finance)下属的政策研究所(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及其前身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分别于 1999、2000 和 2005 年夏为我提供办公地点和各种支持;此外,还要感谢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下属的货币和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于 2001 年夏提供同样的协助。

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众多学者和决策者的指导与建议,他们都来自多个国家和组织,包括日本、美国、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对他们表示感谢。与此同时,在日本、美国、韩国和爱尔兰举行的多个学术和政策场合,与会人员也为我提供了诸多有益意见。除此之外,Tamon Asonuma、Jennifer Donham 和 Saori Nishida 也多次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协助。

衷心感谢那些通读或摘读了各个阶段手稿并提出坦率批评和建议的人。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全球合作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2006 年资助的作者会议上进行,与会者包括 Thomas Berger、David Cowen、行天丰雄、Nobuhiro Hiwa-tari、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Yoshiko Kojo、Yoichi Nemoto 和 Michael Smitka。Michelle Frasher-Rae 对多个章

节提出了看法;同时,Stephan Haggard、Saori Katada 和 Yves Tiberghien 也对《东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中的一篇文章提出了重大建议,本书已获准摘录该文章部分章节。另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的两位匿名读者对本书的最后二稿提出了非常详细、坦率和有益的看法。非常荣幸能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及其卓尔不凡的社会科学编辑 Roger Haydon 再次合作。同样,非常荣幸本书被收入 Eric Helleiner 和乔纳森·科什纳编辑的“康奈尔货币研究丛书”(Cornell Studies in Money series)。

全球合作中心基金在为我争取时间完成初稿和资助两场作者会议的同时,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三人顾问小组,组员都参加了作者会议并提出了其他建设性指导,使我受益匪浅。非常幸运,我的顾问小组非常优秀。顾问小组由行天丰雄、Nobuhiro Hiwatari 和乔纳森·科什纳组成,他们长久以来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卓尔不群,在向我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又使我坚定了对这个重要项目的信念。在近三十五年日本的所有国际金融事业中,行天丰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曾有幸担任他的研究助理,那时他就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而提供帮助。作为日本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位领军人物,Nobuhiro Hiwatari 于 2001 年和 2005 年在东京组织了多次会议。会议期间,我产生了多个想法,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论述。Nobuhiro Hiwatari 通读了我的两份文稿,并做了全面评论,是除我以外唯一出席了两次作者会议的人。大约 15 年前,我曾列席参加了乔纳森·科什纳的论文答辩会,不经意间受他影响而转向了国际货币的大国政治,此后便热切关注他的研究成果。从 2000 年春与我初次探讨我的早期研究成果开始,乔纳森·科什纳便在该项目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并提出了诸多有益建议。同时,我要向已故的 Takeshi Ohta 致敬,倘若该项目开花结果之时他仍健在,我必会邀请他加入我的顾问小组。Takeshi Ohta 是一位优秀的导师,品格高尚,以精湛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义务为我阐释了日本金融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正是以上诸位的指导与建议才使本书进一步完善。当然,本书难免有错漏之处,全因本人水平有限。以上个人或机构无须为本书错漏承担

责任,也无须全盘认同我的见解。

最后,谨向我的亲朋好友表示由衷的感激,感谢他们在我著书期间提供的支持。2005年5月,当我飞往东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研究之时,我的妻子只身一人在家照看我们两岁大的女儿和出生仅十周的幼子;六周之后,他们来到东京,与我在四间转租的配有家具的套房内一同度过了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戴夫(Dave)、Maki Fujii、弗雷德(Fred)和肯德拉·摩根施特恩(Kendra Morgenstern)等一班朋友都不在身边,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如何熬过这段日子的。除在精神上支持我们之外,他们还提供了很多婴儿用具和玩具,有时甚至为我们开车代步。留日期间,我的岳父母德尼丝·斯坦福和吉姆·斯坦福(Denise and Jim Stanford)为我们购买了额外医疗保险,并在我回国后必须出门研究和写作的困难时刻为我们照料一双儿女。他们在我著书期间一如既往地提供了巨大帮助。与此同时,我的父母约瑟夫·格莱姆斯和玛格丽特·格莱姆斯(Joseph and Margaret Grimes)也无时无刻地提供了巨大帮助。当我对本书抱有疑惑之时,他们鼓励我坚持到底。在整个著书期间,我的父亲通读了全稿和各个章节。我那拥有博士学位的母亲认为要我必须喝更多的咖啡来完成此书,并建议我食用巧克力作为辅助。我听从了她的建议,在发胖的同时也更加快乐了。我的孩子伊莎贝尔(Isabel)和威尔(Will)虽然无法完全理解一本没有插图的书有何意义,但他们都热切地希望我能顺利完成本书。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梅琳达·斯坦福(Melinda Stanford)。虽然她并未参加撰写,但本书的完成至少有她一半的功劳。正是她甘心带着幼小的子女来东京度过一个漫长炎热的夏季,才使我得以完成这项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她坚强地面对了挑战,在当地公园的周围推着婴儿车,通过打手势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结交了不少朋友。我出门工作和熬夜写书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中,梅琳达和孩子们都坚持了下来。在整个过程中,正是因为梅琳达我才不断鞭策自己为不辜负她的牺牲而完成这本书。

Contents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致 谢 / 1

引 言 | 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兴起 / 1
金融地区主义的崛起 / 5
中国崛起、战略几何与制度作用 / 6
日本：制衡者 / 8
本书框架 / 10

第一章 | 金融地区主义的战略政治经济学 / 13
经济地区主义的理解方法 / 15
货币、金融与权力 / 16
现实主义传统 / 17
权力与资本 / 20
隔绝，自由化和美元政治 / 28
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分析方法 / 32

第二章 东亚地区崛起:进步与挑战 / 41

东亚地区概念形成 / 43

东亚地区化与地区主义 / 48

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 / 58

东亚的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地区主义 / 65

金融地区主义 / 69

第三章 危机施援 / 77

《清迈倡议》的政治赌注 / 80

从亚洲货币基金到《清迈倡议》:地区反应制度化 / 82

《清迈倡议》细节 / 87

借用信用:《清迈倡议》与 IMF 的关系 / 97

《清迈倡议》与战略三角 / 104

现状能否维持? 决策委托面临的挑战 / 109

第四章 货币管理与货币对抗 / 125

地区货币合作中的政治和经济赌注 / 127

亚洲金融危机 / 130

中国与美元 / 132

对待美元:钉住或脱钩? / 133

日本、日元与地区隔绝事业 / 134

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性与东亚外汇储备增长 / 135

地区货币合作:选择和前景 / 146

战略三角与汇率政治经济学 / 153

第五章 债券市场倡议 / 169

债券市场倡议中的政治赌注 / 172

辨别权力与利益 / 174

债券市场与金融脆弱性 / 177